

《职方外纪》中的国名译词考析

沈 和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Translation of Country Names in *Zhifang waiji*

SHEN He

Abstract

Giulio Aleni's (1528-1649) *Zhifang waiji* ("Record of Foreign Lands," 1623) i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work of geography in the period of "Eastward spread of Western learning." It is considered the most influential Chinese translation of geography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When the ruling class and intellectuals of the Ming Dynasty encountered the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s of foreign country names and place names in the book, those foreign country names and place names entered the Chinese lexicon and spread in various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documents of later generation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organize the main translations of country names in *Zhifang waiji*, focusing on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language contact, from the translation methods of country names, foreign language etymology, analysis of special place names, and words used in translation. Starting from differences, use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categorization of final sounds, it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nslations in *Zhifang waiji*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Chinese lexicon in the future and the unification of foreign country names and place names.

Key words: 艾儒略、国名译词、汉语词汇系统、文化交涉

前言

15世纪下半叶,以哥伦布(Cristóbal Colón, 1451~1506)、麦哲伦(Fernão de Magalhães, 1480~1521)为代表的欧洲航海家们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实现了环球航行,欧洲人随即开启了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促进了西方地理学的飞速发展。16世纪末耶稣会士东渡,西方地理学知识也与其它门类的知识一起传入到中国,掀起了“西学东渐”的浪潮。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和明朝官员李之藻(1565~1630)共同完成的《坤輿万国全图》(1602)是“西学东渐”时期地理学的重要代表作品,图中诸如“熱尔瑪尼亞”、“諳厄利亞”、“金加西臘”、“伯西兒”、“銀河”等,共1114个外来国名、地名的汉字转译形式首次被明朝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所接触,并在后世的各类史地类文献中流传,影响了整个亚洲文化圈。

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的《职方外纪》(1623)是“西学东渐”时期地理学的重要代表作品之一,是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地理学知识的汉译西书,在亚洲文化圈影响巨大。书中的外国国名、地名的汉字转译形式开始进入汉语词汇系统,并逐步被当时明朝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所接触,为后世的各种史地类文献大量引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世作者们对外国地名的转译方式、译词筛选和汉字使用。

一、艾儒略的地理学著作和《职方外纪》的版本

作为“西学东渐”时期早期来华耶稣会士的主要代表人物,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一生致力于将西方的宗教、哲学、数学、地理学等先进知识介绍到中国,被中国人誉为“西来孔子”。¹⁾他的中文文献颇为丰富,如表1所示。

表1 艾儒略的中文文献表

完成年份	文献名	创作时期
1623	万国全图	杭州传教时期
1623	职方外纪	
1623	西学凡	
1623	张弥克尔遗迹	
不明	性学阐述	南京教案前
1627	三山论学记	
1627	涤罪正规	
1627	悔罪要旨	

1) 韩霖、张庚:《圣教信证》,《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台北利氏学社,2009年影印本,第4册,第546页。

1627	耶稣圣体祷文	南京教案前
1628	万物真原	
1629	弥撒祭义	
1630	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	
1631	几何要法	
1635	天主降生言行纪像	
1635	天主降生言行纪略	
1635	天主降生引义	
1637	西方答问	
1637	圣梦歌	
1637	玫瑰经十五端图经（玫瑰经图像十五端）	
1640	口铎日抄	南京教案后
1642	天主圣教四字经文	
1644	圣体要理	
1645	五十言餘	

艾儒略主要的地理学文献有《万国全图》、《职方外纪》和《西方答问》，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职方外纪》。邹（2000）认为明末清初的地理学汉文西书影响最大的当推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所撰译的《职方外纪》，²⁾它是第一部介绍系统介绍西方地理学知识的汉译西书，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关于其成书，《序章》云：

臣等謹案，職方外紀五卷，明西洋人艾儒畧撰其書，成於天啟癸亥，因西洋利氏齋進萬國圖志，龐氏奉命翻譯，儒畧更增補，以成之蓋，因利瑪竇，龐我迪舊本潤色之不盡，儒畧自作也所紀，皆絕域風土，為自古輿圖所不載，故曰職方外紀。

序章原文交代了《职方外纪》成书的过程和缘由，该书是在杨廷筠（1562~1627）的协助下，根据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 1571~1618）和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 1575~1620）的抄本增補而成的。

经调查，《职方外纪》有多个版本，明代刻本主要有三种：第一种，初刻本。共五卷，据李之藻《刻《职方外纪》序》所言成书于1623年夏天，刻印于同年秋天；第二种，国刻本。由福建人王一铸（生卒不详）翻刻，将五卷改为六卷，刻印于1625~1627年间。第三种，《天学初函》收录刻本。1629年由李之藻收录，共五卷。现在见到的明刻本只有《天学初函》本和国刻本，³⁾初刻本已经失传，而《天学初函》收录刻本与国刻本均有多个藏本。

同时，该书在亚洲文化圈影响广泛，为日本早期兰学家们参考和研习，因此在日本也有多种刻本，此处不做展开说明。由于版本众多，为避免各版本间存在国名译词上的差异，故本文不做

2) 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9页。

3) 谢方：《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2000，第6页。

版本内容和译词形式差异方面的对比,只选用清代张海鹏(1755~1816)《墨海金壶》第72册五卷首一卷所收录的刻本⁴⁾为研究对象。书中收录的《职方外纪》全文共五卷,在第一卷卷首包含了《万国全图》影印,从内容和卷数上看,应该是刻印了《天学初函》中的内容。

二、《职方外纪》中的国名译词概述

艾儒略参考利玛窦《坤輿万国全图》成图的《万国全图》附在《职方外纪》第一卷卷首,经观察,部分译词形式与正文中的译词形式存在差异,故一并作为整理对象进行考察。本研究主要涉及到以下国家或地区:鞑靼、阿拉伯、印度、孟加拉、中国、伊朗、土耳其、斯里兰卡、文莱、菲律宾、孟加拉、葡萄牙、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德国、荷兰、比利时、波兰、匈牙利、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冰岛、希腊、俄罗斯、英国、埃及、摩洛哥以及今非洲境内其它四个区域、埃塞俄比亚、刚果、秘鲁、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巴塔哥尼亚、墨西哥、美国、古巴、牙买加、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全书合计46个国家或地区的译词形式按书中出现顺序整理,《万国全图》中的译词整理顺序同书中顺序,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职方外纪》和《万国全图》中的国名译词

《职方外纪》和《万国全图》中的国名译词	翻译类型	现行译词形式	所属大洲	
鞑而鞑	音译	鞑靼	亚洲	
回回	特殊	阿拉伯		
亞刺比亞	音译			
印弟亞、天竺、五印度、莫臥爾	音译	印度		
滿刺加	音译	孟加拉		
中國、大知納、大明	特殊	中国		
百爾西亞、百兒西亞	音译	伊朗		
度爾格、度兒格	音译	土耳其		
則意蘭	音译	斯里兰卡		
渤泥	音译	文莱		
呂宋	音译	菲律宾		
榜葛蠟	音译	孟加拉		
波爾杜瓦爾	音译	葡萄牙		欧洲
以西把尼亞	音译	西班牙		
拂郎察	音译	法国		
意大里亞	音译	意大利		
亞勒瑪尼亞、入爾馬齊亞	音译	德国		
法蘭得斯	音译	比利时和荷兰		
波羅泥亞	音译	波兰		

4)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数据库：<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520749>

翁加里亞	音译	匈牙利	欧洲
大泥亞	音译	丹麦	
諾而勿惹亞、諾而勿	音译	挪威	
雪際亞、蘇厄齊亞	音译	瑞典	
鄂底亞	音译	芬兰	
斐蘭島	音兼译	冰岛	
厄勒祭亞	音译	希腊	
莫斯科未亞	音译	俄罗斯	
諳厄利亞	音译	英国	
阨入多	音译	埃及	
馬邏可	音译	摩洛哥	
弗沙	音译	今摩洛哥境内	
奴米弟亞	音译	今埃及和苏丹境内	
亞毗心域	特殊	埃塞俄比亚	
西爾得	音译	(待考证)	
井巴	音译	(待考证)	
工鄂	音译	刚果	
孛露	音译	秘鲁	
伯西爾、伯西兒	音译	巴西	美洲
蘇木國	特殊		
智加、智勒	音译	智利	
金加西蠟	音译	哥伦比亚	
長人國	特殊	巴塔哥尼亚	
墨是可	音译	墨西哥	
花地、新拂郎察、拔革老、農地、既未蠟、 新亞比俺、加里伏爾泥亞	特殊、音译、音兼意	今美国境内	
古巴	音译	古巴	
牙賣加	音译	牙买加	
墨瓦蠟尼加	特殊	澳大利亚	
新爲匿亞	音兼译	新几内亚	

通过观察表 2，可以获得以下信息：大部分的国名译词为音译词，存在部分特殊类译词和少量音译兼意译类译词；非洲的“西爾得”和“井巴”的具体位置有待考证；“大明”、“百兒西亞”、“度兒格”、“入爾馬齊亞”、“諾而勿”、“蘇厄齊亞”、“斐蘭島”、“伯西兒”和“智勒”为《万国全图》中的译词，与《职方外纪》中的译词存在差异。

三、《职方外纪》中国名译词的特点

1. 音译类译词多为拉丁语或拉丁语系语言转译而来

外来词在进入汉语词汇系统时，大多由于其实意难以与汉语词汇的词义相对应，所以翻译者往往采取音译的方式来转译这些外来词，外来国名或地名的转译就属于这种情况，翻译类型以对音转写为主。这样的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让外来国名的汉字转译形式在汉语的发音上更趋近于转译对象语源的读音。同时，由于音译词在转写时一般不被赋予实际意义，这样的转译方式还能够尽量地不破坏源语言的词义。通过观察表2中的译词形式，笔者认为大部分音译类的国名译词都是由拉丁语或拉丁语系语言为对象进行的汉字转写，Paolo de Troia也认为艾儒略的地名大多是从西班牙文来的。⁵⁾

如：“Portugal”在英语发音中有比较清晰的3个音节，但如果按英语发音显然无法对应“波爾杜瓦爾”的5个音节，葡萄牙在拉丁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中都写作“Portugal”，并且发音都有4~5个音节，基本可以对应“波爾杜瓦爾”的5个音节。而在意大利语中葡萄牙写作“Portogallo”，音节精准对应“波爾杜瓦爾”的5个音节。再如“以西把尼亞”明显是拉丁语“Hispania”或西班牙语“España”的汉字转写，转译后的汉字数量与对象语源发音中的音节数量高度一致。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像“翁加里亞”（Hungaria）是转译自拉丁语系中的某种语言，显然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中“匈牙利”的发音更接近“翁加里亞”；⁶⁾“亞勒瑪尼亞”明显转译自西班牙语的“Alemania”，而非拉丁语、意大利语或葡萄牙语的“Germania”；“諳厄利亞”转译自拉丁语“Anglia”；“意大里亞”转译自拉丁语或意大利语“Italia”；“波羅泥亞”转译自拉丁语“Polonia”；“大泥亞”转译自拉丁语“Dania”等都是以拉丁语或拉丁语系语言为对象进行的汉字转写。

究其原因，是因为17世纪是拉汉互译高峰期，英语还并非当时来华耶稣会士们的主流语言，他们大多来自以拉丁语系为母语的欧洲国家，通晓拉丁语，而艾儒略本身也是意大利人，所以很多译词都是参照意大利语的源语词进行的转译。

另一方面，伴随着“西学东渐”之风由拉丁语或拉丁语系语言为转译对象的外来国名、地名也随着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传入中国，而为了顺利地翻译翻译各类西书，双语辞典也开始出现。1582年，利玛窦到达澳门，以澳门为据点先后到广东、浙江、北京等地传教，1583年到1588年居住在肇庆期间，他与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编撰出了《葡汉辞典》。该辞典是迄今所见存世文献中第一部欧洲语言（葡语）和汉语（官话）对照的双语词典，其罗马字注音系

5) Paolo DE TROIA:《中西地理学知识及地理学词汇的交流:艾儒略〈职方外纪〉的西方原本》,《或問》,2006年第11期,第69页。

6) 叶峰:《“翁加里亞”再考释——〈职方外纪〉校释献疑一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29卷第1辑,第150页。

统或为欧洲人用西文为汉字注音的首次尝试。⁷⁾此后，一些汉西双语词典也先后问世，如：1640年西班牙道明会传教士编写的《汉语西班牙语词汇》和1694年意大利传教士方济会士叶尊孝(Basilio Brolloda Gemona, 1648~1704)编写的《汉语拉丁语字典》等都是拉丁语系语言的双语字典。这些双语字典的问世，间接说明了明末清初，由拉丁语系语言向汉语转译体系的逐步成熟，因此，书中的音译类国名译词以拉丁语或拉丁语系语言为主要转译对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2. 存在大量特殊类和少量音译兼意译类译词

由于当时地理信息和知识还处于探索和更新阶段，一部分区域航海家并未到达，或是认知出现偏差，致使图中的一部分信息想象多于实际，出现了很多今天看似非常特殊，实则有理可寻的译词形式。如表1中的“蘇木國”、“長人國”、“墨瓦蠟泥加”等。

“蘇木國”指的是巴西。经笔者利用BCC语料库⁸⁾进行查证，关于苏木最早的记载是在《诸蕃志》中，该植物产自东南亚，为红色，可作染料。李时珍(1518~1593)《本草纲目》(1578)中也有明确记载，苏木可“行血破瘀”。侧面说明中国人先于欧洲航海家知晓这种植物的特性，并可能先于他们到达过巴西，在那里接触过该植物。而“Brazil”的词源与苏木或苏木中提取的染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利玛窦在音译词“伯西兒”后补充了这个特殊的译词以指代巴西。

“長人國”指的是巴塔哥尼亚(Patagonia)，该地由麦哲伦于1520年在通过麦哲伦海峡时发现，他与当地印第安人相遇，这些印第安人双足包裹动物毛皮以御寒，西班牙人把这些人称为“patagones”，释为“大脚”之意，⁹⁾“Patagonia”也由此而来。

“墨瓦蠟泥加”指的是澳大利亚，是对人名进行的转译。《坤輿万国全图》注：

墨瓦蠟泥係拂郎幾國人姓名，則六十年始過此峽，并至此地，故歐邏巴士以其姓名名峽名，还名地。

《职方外纪》卷四《墨瓦蠟泥加总说》也有云：

先是閩龍諸人既已覓得兩亞墨利加矣，西土以西把尼亞之君複念地為園體，徂西自可達，東向至亞墨利加，而海道遂阻必有西行入海之處，于是治海舶選舟，師裹餼糧裝金寶繕甲兵命，一強有力之臣名墨瓦蘭者，載而往訪墨瓦蘭，既承國命沿亞墨利加之東偏紆迴數萬里，展轉經年歲亦茫然，未識津涯人，情厭敷輒思，返國，墨瓦蘭懼功用弗，成無以復命，按劍

7) 王铭宇：《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词汇问题举隅》，《励耘语言学刊》2014年第1期，第138页。

8)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智能研究院制作，BCC语料库：<http://bcc.blcu.edu.cn/>。文中大部分对于国名译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的考证都通过该语料库，下文举证不做重复说明。

9) Nancy Smiler Levinson. *The Voyage Begins, Magellan: And the First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New York, 2001. pp.68.

下令舟中曰，有言歸國者斬，于是舟人震懾，賈勇而前，已盡亞墨利加之界，忽復海峽五千餘里海南大地，又復恍一乾坤，墨瓦蘭率眾巡行，間闕前進，祇見平原滄蕩杳無涯際，入夜則磷火星流瀰漫山谷，而已因命為火地，而他方或以鸚鵡名州者亦，此大地之一隅其後追厥，所自謂墨瓦蘭，實開此區，因以其名命之曰墨瓦蠟尼加，為天下之第五大州也。

杰拉杜斯·麦卡托 (Gerardus Mercator, 1512~1594) 和鲁墨德·麦卡托 (Rumold Mercator, 1541~1599) 在地图 *ORBIS TERRAE COMPENDIOSA DESCRIPTIO* (1587) 中将这块大陆记作“TERRAAVSTRALIS”，并将其注释为“Magellanicam regionem”，即麦哲伦区。受这种称呼的影响，佩特罗·普兰修 (Petro Plancio, 1552~1622) 在地图 *ORBIS TERRARVM TVPVS DE ITEGRO MULTISILOCIS EMENDATUS* (1594) 中将该地记作“MAGALLANICA”，也就是利玛窦后来转译的“墨瓦蠟泥加”。

除上述几个整理在表 1 中能够对应上现行国家和地区的特殊译词形式外，图中还有像“女人國”、“矮人國”、“黑人國”、“漁人地”、“鸚哥鳥地”等特殊地名。“女人國”在图中注解为：

舊有此國，亦有男子，但多生男既殺之，今又為男子所併，徒存其名耳。

从地理位置和描述来看，指的就是今天的亚马逊地区，在亚伯拉罕·奥特柳斯的地图 *Alexandri Magni Macedonis Expeditio* (1579) 中记作“Amazonum Campi”。利玛窦为何会将词记作“女人國”而不是直接音译？可能和中国母系社会或母系文化有关，在中国古代文献里，有很多关于女人国的记载，如《梁书·东夷传》云：

扶柔东千里有女国。

此女国指千岛的东胡女人国；《旧唐书·西域传》也有相关记载：

又有女國在其西北，相去三月行。

而此女国应在今土耳其西部。¹⁰⁾ 综上，女国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是一个有特殊文化背景的译词，在出现在多个时期的历史文献中，所指代的国家或地区也不尽相同，利玛窦也许是参考了大量中国古籍，使用了这样一个有文化汉译的译词。

再者，“矮人國”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译词，图中注释为：

10) 钟兴麒（编）：《西域地名考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第687页。

國人男女長止尺餘，五歲生子，八歲而老，常為鶴鷓所食。其人穴居以避，每候夏三月出壞其卵（卵）云。以羊為騎。

指北欧拉普人（Lappians）和斯奇芬人（Serickfinns），其皆为身材相对矮小的人种。¹¹⁾此外，像“黑人國”、“漁人地”等很多这样的特殊译词都无法考证或者说法不一，而这些在今天看似特殊的译词形式，大部分都是有所考据的。

但受限于当时的地理认知和信息量，书中并没有记载像我们今天熟知的一些国家，如：新西兰。而对于美国的记载，由于当时对北美大陆的信息量还相对有限，美国也还未正式建国，所以艾儒略在今天美国的领土范围上标注了诸如：“花地”、“新拂郎察”、“拔革老”、“農地”、“既未蠟”、“新亞比俺”、“加里伏爾泥亞”等多个特殊国名或地名，而这些名称无一例外随着地理信息的不断更新和后世作者认知水平的逐步加深而被淘汰。

3. 译词尾音类化、无一名多译的情况

与19世纪初来华新教传教士文献中呈现一名多译、出现译词混乱的现象截然不同，《职方外纪》中的国名译词统一、简洁，这一现象在艾儒略转译国名尾音时进行了用字上的统一方面尤为突出。由于书中译词大部分的转译对象的语源都是拉丁语或拉丁语系语言，所以词尾往往会带有“ia”的词缀，艾儒略则将这样的词缀统一译为“.....亞”。如“Hispania”转写作“以西把尼亞”；“Hungaria”转写作“翁加里亞”；“Alemania”转写作“亞勒瑪尼亞”；“Anglia”转写作“諳厄利亞”；“Italia”转写作“意大里亞”；“Polonia”转写作“波羅泥亞”；“Dania”转写作“大泥亞”等情况都是艾儒略将尾音类化的例子。

另外，文中一名多译的情况除印度和中国对应多个译词形式外，其余译词无论是音译类译词，还是其它类型的译词都不存在将一个国名进行多种形式翻译的情况。印度在文中有“印弟亞”、“天竺”、“五印度”、“莫臥爾”4个译词形式，原因并不是转译对象语源或是同音异字使用的关系，而是因为印度与中国距离较近，接触时间早于大部分其它洲的国家，所以较早地被文献所记载，命名理据相对统一，也不存在歧义。如“天竺”在很多佛经里就有记载，唐代释慧琳（737~820）《一切经音义》（807）：

天竺（今作[卅馬]或言身毒或云贤豆皆讹也正言印度此翻名月月有千名斯其一称良以彼土圣贤相继导凡化物如月照临因以名也）。

元代释子成（生卒不详）《折疑论》（1351）：

11) James Minahan. *Encyclopedia of the Stateless Nations*.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2002, pp. 1636.

珠双双，文郁郁，楂梨却也寒枯。没来由，空剥碌，挽却早图天竺。

再如“五印度”，唐代道宣（596年～667年）《释迦方志》（650）：

五印度以为释迦河门生福灭罪处。常有百千人澡濯。

直到清代洪弃生（1866～1928）《寄鹤斋选集》仍在使用的：

自道光初英吉利蚕食五印度、侵及满刺加，渐及大陆矣，而犹未迫中土也。

综上，这一类理据固定的译词大部分从唐代佛经和典籍开始就已经有了相关记载，并一直在后世的各类文献中得以保留和沿用，而在耶稣会士们的汉译西书中同样被继续使用，且译词形式固定。

而中国在文中的译词形式除传统的“中國”外，还有“大知納”这样一个特殊的译词。《亚细亚总论》记载：

從南涉北，共得二十四度，徑六千音搃里，東西大抵畧同，其距大西洋路幾九萬，開闢未始相通，但海外傳聞，尊稱之為大知納。

这里的“知納”与“支那”是同音异字的关系，“支那”来源于印度的梵语“cina”，最初是中国僧人翻译佛经时进行的音译，同样是一个理据固定的译词。

唐代玄奘法师（602～664）取经过程中的见闻撰写而成的《大唐西域记》（646）一书中，记录了他与戒日王的对话：“王曰：‘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亘，去斯远近’。对曰：‘当在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是也’。”“摩诃”就是“大”的意思。摩诃至那就是大至那的意思。宋代《五灯会元》（1252）明确记载了中印度宝掌和尚到达中国进行游历的时间是在贞观十五年（641），这说明最晚在贞观时期外国人已经称中国为“支那”。¹²⁾唐朝时，空海和尚（778～835）等人，把这个词带回了日本，当时的意思主要是指中国本土。因此早些时候日本称“支那”，并没有贬义，甚至因为盛唐的强大而带有敬重之意。但到了明治时期（1868～1912），尤其19世纪末期，这个词就成了含有鄙夷之意的蔑称，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45年后才有所改善，直到1972年中日建交后，日本才逐步摒弃该词的使用。时至今日，“支那”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好词。但在《职方外纪》中，艾儒略在“知納”前加了一个“大”字，而且还有“尊称”的字眼，显然在那个时期艾儒略对中国的态度充满了尊敬。

12) 朱文通、陈瑞青：《历史文献学的考察视角“支那”词义的演变轨迹》，《石家庄铁道学院报》2007年8月第1卷第1期，第67～68页。

4. 译词受方言影响

《职方外纪》中的译词受方言的影响，最明显的就是“渤泥”，即文莱（Brunei）。文莱与中国的关系在明朝初期达到了顶点，南京安德门外至今还保留有《淳泥国恭顺王墓碑》。其实早在宋代，文莱就与中国有所接触，南宋赵汝适（1170~1231）的《诸蕃志》（1225）中就有记载：

渔者以秋间月夜采摘，肉亦可吃。出渤泥、三屿、蒲嘿噜、阁婆诸国。黄蜡黄蜡，出三屿、麻逸、真腊、三佛齐、策国。蜂出于深山穷谷中，或窠老树、或窠芭蕉树、或窠岩穴，较诸中国之蜂差大而黑。

赵汝适本人长期在福建泉州市，担任当地舶司提举，而“文莱”的发音有很明显的闽方言特征，闽方言中的“文”的发音时母音去鼻音化读作“bun”，“莱”读作“nai”，与“渤泥”的发音相近，最终取而代之，并沿用至今。

5. 与《万国全图》中国名译词的比较

上文提到过，《职方外纪》中的国名译词除印度和中国外都不存多个译词形式，但若对比《万国全图》中的国名译词，就存在中国、伊朗、土耳其、德国、挪威、瑞典、巴西和智利8国译词间的差异，除“斐蘭島”仅在《万国全图》中有记载外，余下译词按照《职方外纪》、《万国全图》的顺序整理如下面8组：

- (1) “中國”、“大知納”；“大明”
- (2) “百爾西亞”；“百兒西亞”
- (3) “度爾格”；“度兒格”
- (4) “亞勒瑪尼亞”；“入爾馬齊亞”
- (5) “諾而勿惹亞”；“諾而勿”
- (6) “雪際亞”；“蘇厄齊亞”
- (7) “伯西爾”；“伯西兒”
- (8) “智加”；“智勒”

笔者认为出现差异的原因有三个：首先，是比较特殊的一类。像中国的几种形式都有很固定的理据，是一种约定俗称的习惯，不存在歧义，图中的“大明”应该是参考《坤輿万国全图》的结果；另外“諾而勿”的使用我认为是图中空间有限而进行的节译或缩写。其次，同音异字的使用。“爾”和“兒”属于同音异字，图中使用“兒”也许是考虑到其笔画较少的缘故，侧面反映了汉语词汇系统的优化，开始使用简便字。最后，转译对象的不同，造成汉字使用的不同。“亞勒瑪尼亞”转译自“Alemania”，“入爾馬齊亞”转译自“Germania”；“雪際亞”转译自“Suecia”，“蘇厄齊亞”转译自“Svezia”；“智加”转译自“Chica”，指的是今天的巴塔哥尼亚地区的一部分，“智勒”则转译自“Chile”，严格来说只存在部分区域的重合，并不完全指同一个地方。

综上, 由于《万国全图》是参考过《坤輿万国全图》, 故存在少数使用《坤輿万国全图》中国名译词的情况。其次, 同音异字“爾”和“兒”的使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来国名译词初步进入汉语词汇系统, 并逐步开始优化用字的现象。

6. 与《西方答问》中国名译词的比较

《西方答问》(1637) 作为艾儒略另一部“西学东渐”时期的重要地理著作, 全书以口语化问答的形式, 分上、下卷记述了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的共42篇文章, 笔者选择了明崇祯十年(1637) 晋江景教堂本为研究对象。经整理, 有国名译词记载的文章仅有“国土”“路程”“海险”“海贼”和“国王”5篇, 出现的译词形式共19个: “朝鲜”、“日本”、“琉球”、“鞞鞞”、“回回”、“西天竺”、“如德亞”、“安南”、“交趾”、“暹羅”、“佛柔”、“緬國”、“滿刺加”、“呂宋”、“中國”、“意大利亞”、“墨瓦蠟尼加”、“玻羅尼亞”、“亞勒馬尼亞”。经笔者考证, 上述译词形式与《职方外纪》中的国名译词相比较, 区别仅有三处: “緬甸”记作“緬國”, 属于使用国名简称的情况; “玻羅尼亞”记作“玻羅尼亞”、“亞勒瑪尼亞”记作“亞勒馬尼亞”都属于同音异字的情况。该书记载的国名译词数量相对较少, 出现的译词形式大多都与《职方外纪》保持一致, 仅在个别译词形式上存在同音异字的情况, 客观说明艾儒略在其地理书中国名译词的用字上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

7. 国名译词的用字原则

汉语是表意的语言, 汉字本身的字义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在转译外国名译词时, 汉字的使用会直接影响读者对该其翻译理据及特征上的初步印象。从用字原则上讲, 国名译词中的用字应当选用中性或带有褒扬色彩的汉字, 但《职方外纪》中的国名译词用字并没有遵循这一原则, 意义无关联汉字时常在译词中出现。

如“波爾杜瓦爾”的“杜”是姓氏; “以西把尼亞”的“把”可作动词、介词, 在汉语中有较多词性; “翁阿里亞”的“翁”指长者; “鄂底亞”、“榜葛蠟”、“墨是可”等译词形式的用字都没有具体意义, 出现在国名里非常容易让人产生其他方面的联想, 这些汉字的出现都属于意义与表达内容无关联的用字, 既不符合国名译词用字的原则, 也不带有任何国家的属性特征。

此外, 书中也有国名译词使用贬义字的情况出现, 但仅在“諳厄利亞”和“厄勒齊亞”中的“厄”字上有所体现:

《說文解字》: “厄, 科厄, 木節也。”《文選·左思·魏都賦》: “英辯榮枯, 能濟其厄。”
《贈徐州族姪》: “歲時易遷次, 身命多厄窮。”

该字在各类古代文献中有着不同的解释, 大致可解释为: “樹木的節; 災難、困難; 困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 该字从汉代时期的中性字义逐步发展成唐代的贬义字, 但由于这些外来国名刚刚进入汉语词汇系统的缘故, 贬义字在《职方外纪》中并不常见。此外, 在国名译词中使用美化

字的情况也没有在书中体现，这也更进一步说明当时的耶稣会士在转译外国名或地名时，可能对用字还未进行过详细考量，否则“东方伽利略”徐继畲（1795~1873）也不会《瀛环志略》（1848）中有以下描述：

泰西人如利瑪竇、艾儒略、南懷仁之屬，皆久居京師，通習漢文，故其所著之書文理頗為明順，然誇誕詭譎之說亦已不少。近泰西人無深於漢文者，故其書多俚俗不文，而其敘各國興衰事蹟則確鑿可據，乃知彼之文，轉不如此之樸也。¹³⁾

徐继畲肯定了耶稣会士们的汉译西书，但认为他们的行文用字较为粗鄙，不够雅致。这段话也侧面反映了明末传入中国的外来国名译词刚刚进去汉字词汇系统，优化过程还处于起步阶段，转译外国名时还并未形成一套体系完整的用字原则。

结语

《职方外纪》是第一部介绍系统介绍西方地理学知识的汉译西书，是继《坤舆万国全图》后“西学东渐”时期早期来华耶稣会士们的重要代表作品。艾儒略在努力向中国传播西方地理学知识的同时，也将外来国名和地名的汉字转译形式通过地图以外的另一种载体形式引入到汉语词汇系统中。

同时，在国名译词进入汉语词汇系统初期，在译词的转译方法、理据考证、尾音类化、方言受容和汉字使用等方面扮演了先驱者作用。为日后中、西作者进一步筛选和优化外来国名译词时提供了有力而丰富的素材，是诸多国名译词的最终定型和统一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13) (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序》，棧雲樓，1873年影印本，第6页。

